

清代官窑瓷业的技术成就与陶官制度

刘 淼

(厦门大学 历史系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[内容提要] 清代前期御器厂的制瓷工艺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颠峰, 官窑瓷器品种繁多、新意叠出, 斑斓多样、工艺精湛。清代官窑瓷业在仿古和创新上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, 制造出无数的陶瓷精品。清代官窑瓷业取得如此重要成就, 是与康乾时期陶官制度下的有效管理分不开的, 督陶官们凭借他们的艺术禀赋, 潜心创新工艺, 忠诚于宫廷御器制造业, 对御窑精心有效的管理, 使清御器厂的陶瓷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。

[关键词] 清代; 官窑; 成就; 督陶官

[中图分类号] K249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0-422X(2008)01-0056-07

官窑是中国古代陶瓷手工业的重要组织方式, 在特定历史时期还是陶瓷业创新、提高的技术集大成者, 引领陶瓷的整体发展与进步。清代前期官窑的制瓷工艺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颠峰, 康、雍、乾三朝御器厂在瓷器的仿古和创新上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对于清代御窑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, 督陶官起着无可替代的突出贡献, 如臧应选、郎廷极、年希尧、唐英等督陶官, 他们工于创新, 忠于朝廷, 精心管理, 造就了中国古代官营瓷业的“黄金时代”。正因如此, 清代御窑形成了以督陶官姓氏命名的传统, 其最著者当属“臧窑”、“郎窑”、“年窑”和“唐窑”。对清代前期陶官制度促进官窑手工业的技术进步, 学术界关注不多, 本文拟对此做初步探讨。

一 清代前期官窑手工业的技术创新

在清初督陶官的有效管理、精心研究及努力创新之下, 清代御窑的生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, 制造出无数的陶瓷精品, 如“臧窑”的青花五彩, “郎窑”的郎窑红、素三彩、粉彩, “年窑”的仿古瓷、珐琅彩瓷, “唐窑”的镂雕造型、胭脂水彩、洋花彩绘等。这些技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仿古基础上的艺术创新。

1 臧窑

“臧窑”指的是康熙二十年(1681年)二月至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负责督造的御窑。它代表了康熙早期景德镇瓷器的制作水平。

据《景德镇陶录》载:“康熙年臧窑, 厂器也。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, 土坯腻, 质莹薄, 诸色兼备。有蛇皮绿、鳝鱼黄、吉翠、黄斑点四种尤佳。其浇黄、浇紫、浇绿、吹红、吹青者亦美, 迨后之唐窑犹仿其釉色。”^① 臧窑的成就重点就在单色釉上, 这一点也可以从传世的康熙官窑瓷器的情况得以证实, 而且单色釉上又以鲜红最为突出。另外, “臧窑”还仿宣成做法, 制造青花五彩器, 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“臧窑”的另一个成就是开始试烧珐琅彩瓷。见《瓷器概说》中“珐琅彩瓷”条记载:“清代瓷器中有一种至精至美、驰誉全宇之品, ……即世所称古月轩器也。考此类彩瓷, 肇端于康熙二十年后, 臧应选督造之时。”^② 然而此时的珐琅彩瓷处于试烧的初期阶段, 且似乎并未取得成功。^③

2 郎窑

康熙四十四年(公元1705年)到五十一年(1712年)在江西任巡抚的郎廷极主持下的御器厂, 习惯上称其为“郎窑”。它代表了康熙晚期景德镇瓷器的制作水平。

[收稿日期] 2007-11-15

“郎窑”的最大成就在于郎窑红的烧制成功。然而明代宣德红釉的“脱口”为自然形成的白口，而康熙郎窑红的“脱口”则是人为涂饰的一层厚而含有粉质的白釉或浆白釉。^④此外，“郎窑”还仿宣德豇豆红、青花，仿成化的青花、斗彩和仿永乐的白釉脱胎器。刘廷玑的《在园杂志》中认为“郎窑”“仿古暗合，与真无二。其摹成宣，釉水颜色、橘皮棕眼、款字酷肖，极难辨别。”对于“郎窑”的描金五爪双龙酒杯，“欣以为旧”，又青花白地盘，“以为真宣”，对于“郎窑”的脱胎极薄白碗，认为“与真成毫发不爽”，于是“诚可谓巧夺天工矣。瓷器之在国朝洵足凌驾成宣，可与官、哥、汝、定媲美。”^⑤与郎廷极同时期的康熙时人许谨斋的《郎窑行，戏呈紫衡中丞》诗中也叙述了郎廷极督造瓷器的情况：“宣成陶器夸前朝，……迩来杰出推郎窑，……郎窑本以中丞名，……敏手居然称国器，比视成宣欲乱真，乾坤万象归陶甄；雨过天青红琢玉，贡之廊庙光鸿均。”^⑥康熙晚期，还创烧了霁红。康熙霁红是一种纯粹的深红釉，它以釉如橘皮、失透深沉、白底官款的特点区别于郎窑红器。

“郎窑”还发展了正德时已有的素三彩瓷器，它的彩色除了黄、绿、紫外，增加了当时特有的蓝色。“郎窑”开创了在素烧胎上施以绿、黄、茄紫三色的素三彩，上面不施釉料的加彩方法，从而使加彩方法更为多样。郎窑时开始出现胭脂水釉瓷器，胭脂水釉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含金的色釉，因而异常珍贵，均为官窑产品。

最后，“郎窑”可能已创制了粉彩。《瓷鉴》中写到“粉彩色始于康熙末年，因未见粉彩之物有题康熙款者，故皆以为始于雍正初年耳。”可见，在“郎窑”时，景德镇的陶工很可能在珐琅彩的启发和影响下创烧了粉彩色料。粉彩是以珐琅彩的白料色彩作为粉彩的乳浊剂，即以玻璃白打底。它和珐琅彩可相媲美，具有同样的立体效果，但造价低，可在御器厂进行生产。乾隆八年《陶冶图说》载：“圆琢白器，五彩绘画，摹仿西洋，故曰洋彩。……所用颜料与珐琅色同。”^⑦其中的洋彩即为粉彩。

3 年窑

雍正四年（公元 1726 年）督理淮安板闸

关税务的年希尧兼管官窑瓷务，直至乾隆元年（1736 年）这时期的官窑产品被称为“年窑”。年希尧总理窑务，而从雍正六年（1728 年）开始，唐英便以内务府员外郎之职奉命驻厂协理瓷务。因而年窑的成就应包括年希尧与唐英两个人的贡献，又尤以唐英的贡献更为突出。

“年窑”时“物力富裕，工事精良”，仿古成就最高。《景德镇陶录》中“雍正年年窑”条记载：“厂器也，……选料奉造极其精雅，……琢器多卵色，圆器莹素如银，皆兼青彩，或描锥暗花玲珑诸巧样，仿古创新实基于此。”^⑧另外，《景德镇陶录》中还有宣德器、成化器仿于“年窑”的记载。由此可见，“年窑”着意于仿古名瓷及仿宣德、成化之器，瓷质莹洁，工艺精良，品类繁多。尤以仿古青瓷成就最高，徐康《前尘梦影录》中称其为“雨过天晴”，达到了青瓷烧造历史上最成熟的水平。另外，仿钧釉、仿霁红成就也高。青花仿宣德、五彩仿成化也都工致殊常。

“年窑”的釉色也更加齐备和丰富多彩。《景德镇陶录》中记述唐英督陶的成就时说：“又新制洋紫、法青、抹银、彩水墨、洋乌金、珐琅画法、洋彩乌金、墨底白花、天蓝、窑变等釉色器皿。”这里所列举的品种，唐英于乾隆元年所作的《陶成纪事碑》中几乎都已载入，说明这些成就在雍正年间已经取得。^⑨

此时，雍正朝由于宫中自炼珐琅料的成功，珐琅彩瓷的生产全面展开，需要精致的高质量的白胎薄瓷，《陶雅》中称其为“质地之白，白如雪也；薄如卵幕，口嘘之欲飞。”而这些优质白瓷均由御器厂负责烧造。由唐英将上好的瓷胎解运至京，呈皇帝亲选。雍正珐琅彩瓷瓷胎细腻如脂，纯白似雪，对着日光照射，可以清晰的映现出对面的纹饰。取得如此精妙的成就，应该有“年窑”的突出贡献，更理应有唐英卓越的督窑之功。

自炼珐琅料的成功，为景德镇御器厂生产彩瓷提供了充足的“玻璃白”，且御器厂也为粉彩烧制提供了高质量的白瓷，再加上粉彩自身具有的与珐琅彩相同的艺术效果但较低的造价，于是粉彩在“年窑”时可批量生产，进入兴盛时期。

4 唐窑

“唐窑”是指唐英于乾隆元年(1736—1749年)和十七年至二十年(1752—1756年)两段时间内督理的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瓷器。从唐英奏折中可以看出,他于乾隆元年至三年离厂管理淮安,后奏请专司窑务,在乾隆四年正月得以准奏。原唐英管理的宿迁关税务,暂令办理淮安关税务的三保兼理。于是唐英于乾隆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抵江西窑厂,所以三月得以在厂亲自办理。^⑩但很快他被任命管理九江关税务。九江关距厂三百余里,每年可赴厂两次,他又奏请由九江关知府暂管关务,使之可以多住时日,料理窑务,但一年中也只有一两个月监看。^⑪但是,他培养了得力助手老格,因而“唐窑”的成就应该是唐英和老格共同协作的结果。

“唐窑”继承雍正时“年窑”已取得的各种仿古成就,继续仿制历代名窑。特别是历来被视为造化、天工的恩赐的“窑变”,唐英使它成为了有规律可循的技巧,可以作到“人工故意制成”^⑫。

然而,“唐窑”最突出的成就还在于创新,体现在注意装饰效果和造型上。唐英和老格共同研制出许多奇特的造型,如镂空转心瓶、镂空转心套瓶、镂空交泰瓶,以及通体镂空的灯罩、香薰、花篮、冠架等,还制成了玲珑瓶。这些器型充分发挥了镂雕技法,既有实用价值,又可做陈设品,集艺术和工艺于一身,反映了精湛娴熟的制瓷工艺,有很强的科学性。

“唐窑”在彩、釉的装饰效果上也多有创新,集中体现了繁缛、细腻的艺术风格。现存于故宫历代艺术馆里的“瓷母”充分体现了“唐窑”在施釉及彩的方法上的创新和进步。“唐窑”在彩和釉上的另一个创新是用胭脂水彩绘器物,构成前所未有的纹饰图案,有时和青花搭配,能得到青花釉里红的效果。粉彩发展到“唐窑”时,在图案花纹上显得渐趋繁缛,不但在瓷器上作画,而且作为装饰色对陶瓷的仿手工艺品和仿象声瓷进行装饰,且出现了青花粉彩、轧道粉彩、开光粉彩等多种工艺。此时的珐琅彩瓷的彩色地上也采用轧道工艺,俗称“锦上添花”,极为精细、费工,难以仿制,是前所未

有的创新之举。珐琅彩瓷在图案上也益加精进,变板滞为生动,而“英卒后,遂成绝迹矣。”^⑬“唐窑”仿各种工艺品和象声瓷也达到高度水平。另外,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西洋人物画及由“洋花”组成的图案,是乾隆时期“唐窑”瓷器纹样的一项特殊成就。

二 督陶官对官窑瓷业创新的促进作用

“中国有陶始于神农,至舜而术益进……由黄帝至周室皆有陶正。”^⑭我国古代官营陶瓷业的陶官制度历史悠久,历朝都曾置陶官管理陶瓷生产。明清时期,政府设立御窑厂,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只负责陶瓷生产管理的督陶官,御窑督陶官的作用更为突出和重要。明清两代督陶官在职责上也有着很大的区别,明代多任用宦官督陶,清代派往景德镇督陶的都是具有专业素养的品官,清代督陶官的任务不仅仅限于督理一般的瓷器烧造,同时还带领御器厂少而精的才技优异之人从事陶瓷生产的研究,在更高的艺术和技术上进行追求。清代官窑瓷业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,是与康乾时期陶官制度下的有效管理分不开的。康、雍、乾时期的督陶官,如臧应选、郎廷极、年希尧、唐英等,凭借他们的艺术禀赋,潜心创新工艺,忠诚于宫廷御器制造业,对御窑精心有效的管理,使清御器厂的陶瓷艺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。

1. 清代督陶官制度的完善是提高御器厂生产效率的重要保证

清初御窑的陶政管理达到了“政善工精”的程度,督陶官们深知“民以陶利,亦以陶病”的道理,而且明白“得其道则事半功倍,失其道则功废人劳”^⑮,本着“工匠疾苦宜恤,商户交易宜平”^⑯的宗旨,无论在陶政管理制度上还是在福利上,均采取了一系列利民、恤民的措施,从而充分调动工匠和民窑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,这也是清初御窑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所在。

在御窑的生产上,编役、匠籍制度已尽数废除,御窑厂工匠夫役的主要成分也已由雇佣匠役组成。^⑰御窑厂内三百多名从事造型和装饰的工匠及其办事人员的工值,照当地窑户雇工计价付酬,吸取了一些民窑雇佣制的因素。这

就减轻了工匠的负担,提高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,从而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。

明代御窑的派役情况非常严重,不仅料价分派各省,且办事人役的派送及其供应银两,解运御器的箱用包器的棉花、黄纸诸项,甚至付给雇佣役的钱,都向地方和人民分派解征。结果人民负担过重,疲于奔命。康熙二十年臧应选驻厂督造后“每制成之器,实估价值陆续进呈御览。凡工匠物料动支正项钱粮,按项给发,至于运费等项并不贻累地方,经画多方,官民称便”^⑧,且“向有上工夫派饶州属邑者悉罢之,每开窑,鸠工庀才,动支内府,按时给值,与市贾适均。”^⑨以后的几届督陶官也都继承了这一利民传统。御器烧造中所需要的工价和物料费用等,在臧窑时是用江西藩库的正项钱粮,由工部奏销;年窑时,用淮关税收,岁底呈销内务府;唐窑时用九江关税银。而这些钱粮的征收和使用权又都掌握在督陶官手里。臧应选督陶时为工部虞衡司郎中,年希尧督陶时准淮安板闸门,而唐英督陶时则准九江关。因而清初的督陶官较明代来说有更多的自主权,因而他们在陶务上都能比较灵活且认真。

在解运制度上,清代御窑不仅解运费有了固定数额,悉动共币,不再扰民,而且有了固定的解运路线,不再象明代那样时常变动,不成定制,造成解运项开支浩大,浪费惊人。根据《风火神庙碑记》中记载:“年公希尧云:‘……一岁之成,选择包厢,由江达淮,咸萃予之使院,转而贡著内廷焉。’”^⑩从中我们可以知道,年希尧时御器的水运路线是由浮梁装船后,先由江达淮,至淮安板闸关,集中于使院,然后再转而贡诸朝廷。实际上从雍正六年起一直到乾隆三年,御器都是先运到淮关署内配成匣座,转运进京。乾隆四年以后,凡烧造之器,配座、装桶、解运,全由唐英一手办理,直接运到京师,以免由淮绕道,且免了护送声扬之繁。^⑪同时,上色品与选落的次品一律装桶解京。上色品以供御用,次色品以备赏用。这在《景德镇陶录》的“厂器岁解运数例”中亦有记载。

唐英继承了前朝督陶官的利民传统,并使之得以深入发扬。他为督陶官时主持的“官搭民烧”制度,虽不是清代实行此制度最早之先

例,^⑫但实行的较为彻底和稳定。明代的“官搭民烧”有很大的强制性和剥削性,往往在包青窑中搭烧。而“唐窑”时,“官搭民烧”已不再具有强制性。当时的御器厂只具造型和装饰作坊,器物的烧成散搭民窑。御器厂给承烧窑户的酬劳“与市贾适均,且格外加厚”。所有入窑瓷坯,不论上品还是次品均按上色瓷器给价,且“窑价公发之外,填增酒食”。于是“窑户率以致富,乐于趋事”^⑬。因而清初督陶官不再是专门搜刮民财的工具,而是得以充分调动民窑生产的积极性,促成了官民互利。清代“官搭民烧”的全面展开,减轻了御器厂的负担。御器厂的定员仅有二、三十人,多是才技优异之人,少而精,有生产积极性。

另外,为激发工匠们的热情,获得工匠们的信赖和支持,清初督陶官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措施,尤以唐英时最为细微和有效。“匠有疾病者,延医制药而急救;匠居窘窄者,买房赏住以安身;年迈匠人,另赐衣帛食肉;众餐余积,呼来童叟均分。”“冬闻匠有债急,预叫金银;空囊而旅丧无依者,济以买棺买葬;将娶而未能娶者,周其室宜其家。”^⑭同时对工匠赏勤劝惰。正是在督陶官的有效管理之下,清初御器厂“惠工给值,供役无扰;民安而物埠,工勤而器良”,出现了“镇人日以盛,镇陶日以精,莫不兴奋鼓舞”^⑮的局面。

2 任用具有专业素养的督陶官是御器厂不断创新的技术基础。

清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帝均有着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审美情趣,他们都对陶瓷事业显示了异常的关心和重视,表现在对督陶官的任用上是非常谨慎的,是有目的、有选择的加以委任。唐英是于雍正二年八月秋,“怡亲王口宣天语”^⑯,授命英督监江西窑务的。由于他督陶卓有成效,直到乾隆二十一年病重才允许解任。乾隆“唐窑”时著名的协理官老格是由内务府总管海望保奏派厂协造的。协理官本是三年一换的,由于唐英重视,两次在皇帝面前具奏折奏请老格留任共达十余年。^⑰郎廷极“晦政称是”,“通籍三十年,所至无不赫赫名”^⑱,年希尧也是“忠厚安分之人”^⑲。且当时宫廷对督陶官的待遇可达到“岁赐薪水之费五百金”,因而“举

家佩德饱恩”³⁰。同时三帝还常常亲自干预陶瓷生产,以示重视。

无论是臧应选、郎廷极、年希尧还是唐英,他们自身都有着极高的艺术造诣和文化素养,且他们都对陶瓷事业有着共同的爱好和情怀。据史书记载,郎廷极从小聪慧宽厚³¹,文学艺术成就俱高,曾著有《文庙从祀考》。他还酷爱古器,对陶瓷史很有研究。许谨斋的《戏呈紫衡中丞》中写到:“郎窑本以中丞名,中丞嗜古衡鉴精,网罗法物供名藻,三千年内纷纵横。……中丞嗜古得余意,政治余闲呈艺事,地水火风凝四大,敏手居然称国器。……”³²郎廷极“嗜古”、“呈艺事”,即热心于陶瓷研究和创作的情况已很明了。年希尧曾和郎世宁等宫廷画家共同研究绘画技巧,学习了西方的透视技法,并编撰了《视学》一书。这种画法为景德镇陶瓷的装饰艺术创新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,促进了彩瓷的创新和发展。

然而,最具才华、最热爱陶瓷事业且对御窑的陶瓷生产贡献最为突出的还应该是唐英。唐英十岁读书,博学多才,十六岁起供役于养心殿,四十二岁授内务府员外郎。他善绘画,工书法,诗文书谱样样精通,是康熙二帝所宠爱的宫廷艺术家之一,后又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。他天资聪颖,颇具才华,加之宫内所藏历代艺术品的熏陶,使他在历朝督陶官中更显出类拔萃。这种广博的才华,为他在瓷器艺术创作的天地里遨游奠定了良好的艺术基础。

由于督陶官也为有才学的专业品官,加上他们的任期长,对陶瓷的生产工艺熟悉,重要的是他们的职责相对于明代督陶官来说要清闲的多,因而有足够的精力去从事陶瓷生产的研究工作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,清代御器厂具备了现代研究院、所的性质。³³另外还利用新技术对旧产品进行改造,从而制瓷技术也有了更大进步,据唐英奏折中可得清御窑成品率可高达50%左右。

3 御器厂的技术成就还与督陶官忠于朝廷、潜心奉献分不开

清初御窑的实质还是服务于宫廷和皇帝,督陶官正是出于忠君、为皇帝服务的目的,投其所好,长期在第一生产线上献身陶瓷事业、默默

贡献,千方百计进行研究和创新,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清初御窑的发展,主要指唐英和老格。

唐英自雍正六年驻景德镇御器厂协理年希尧陶务后,便以强烈的事业心扑到了陶务上去。他亲自参与窑务,以匠人为师,“杜门谢交游,聚精会神,苦心戮力,与工匠同食者三年”。仅利用短短的三年时间,便基本掌握了瓷器工艺的过程和细节一直到乾隆元年的八年中,他始终忙碌于单调而辛苦的陶瓷生产和管理上。即使在他升职、迁为“养心殿总监造”兼江南淮、宿、海三关和九江湖口大孤口关税课、督理江西江西陶政后,依然没有放弃对陶瓷生产的指导和参与,常设法挤出时间亲临窑厂,与工匠一起研讨技艺,指导生产。

仿钧釉的调查研究、珐琅彩瓷等的创造和发展,都是为了满足康熙乾隆三帝的鉴赏需要,甚至是在他们的亲自要求和督促下进行的。在唐英奏折中常见他有在厂新拟瓷器品种的记载,如《唐英奏恭进奉发及新拟瓷器折》、《唐英奏恭进上传及自拟新样瓷器折》、《唐英奏恭进上传及偶得窑变瓷器折》、《唐英奏恭进上传及新样瓷器折》等,他甚至不惜“自出工本,试造进呈”,只为“仰祈鉴定”,³⁴可见其用心良苦。唐英还和老格共同研制了许多新型种类以呈进乾隆皇帝。

另一个贡献突出的人便是唐英升职后协理唐英的老格。唐英当时因为公务繁忙,兼理窑务,只充遥领,距厂三百多里,不能逐件指点。因而当时老格便接替唐英分发钱粮,置办物料,兼司造作。且每次唐英来厂巡视,老格都向他虚心求教,和唐英一起共同探讨研究,成为唐英的得力助手。再加上长年的生产实践,老格也很快成为有经验的制瓷能手和理窑行家。老格正是以其品催总的身份,在厂办事业经十年,但从无怨言,成为继唐英之后,又一个对我国陶瓷生产尤其是对清初御窑生产做出贡献的人。

三 结语

清初督陶官不仅把清御窑推到了技术和艺术的顶峰,而且也因此带动了整个景德镇陶瓷业的繁荣。由于御器厂的许多技术成果和艺术

成就不再秘不示人,得到了广泛传播,加上督陶官在陶政管理上官民互利方针的贯彻执行,带动了民窑的进步和发展。景德镇市场上甚至出现了“官民竞市”——御器厂同民窑争夺市场的现象。乾隆二十一年的《唐英奏次色瓷器变价不能年清年款折》正好说明了官民竞争的这一情况。^⑤这种竞争,既激励了御器厂自身艺术质量的不断提高,又推动了景德镇窑厂整个艺术水准的高涨。

同时,清初督陶官还注意总结。唐英于乾隆元年编成《陶冶图说》,对景德镇瓷器从原料鉴别到瓷器烧成的生产流程、工艺规范、技术指标、操作要点等,都作了详尽而科学的总结。在《陶成记事碑》中,把宋元明清的各种著名的釉彩作了全面的总结。这两部陶瓷专著,到现今仍有重要的科学和史料价值,其中有些技艺一直沿用至今。

清代督陶官管理下的清御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,从而巩固了景德镇瓷都的位置,使它不仅是中央王朝御用瓷器的生产基地,同时又是世界瓷器生产的中心,景德镇名声从此大振。尽管后来御器生产每况愈下,但景德镇的商品瓷器却继续受到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喜爱,其影响至今犹存。

注释与参考文献:

- ① [清]蓝浦:《景德镇陶录》载桑行之:《说陶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,198页。
- ② 郭葆昌:《瓷器概说》载桑行之:《说陶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,246页。
- ③ 王健华:《清代宫廷珐琅彩综述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93年第3期。
- ④ 余继明、杨寅宗:《中国古代陶瓷鉴赏辞典》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2年,90页。
- ⑤ 刘廷玑:《在园杂志》,转引自程哲《窑器说》载桑行之:《说陶》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,368页。
- ⑥ 《许谨斋诗稿,癸巳年稿》,转引自中国硅酸盐学会:《中国陶瓷史》文物出版社 1982年,431页。
- ⑦ 转引自蔡毅:《论粉彩》,《文物》1997年第3期。
- ⑧ [清]蓝浦:《景德镇陶录》载桑行之:《说陶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,198页。
- ⑨ 中国硅酸盐学会:《中国陶瓷史》,文物出版社 1982年,418页。

- ⑩ 唐英:《奏到厂日期折》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二辑·乾隆朝史料》中华书局 1987年,3页。
- ⑪ 唐英:《奏赴窑厂经理瓷务折》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二辑·乾隆朝史料》中华书局 1987年,4页。
- ⑫ 许之衡:《饮流斋说瓷》载桑行之:《说陶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,55页。
- ⑬ 郭葆昌:《瓷器概说》,载桑行之:《说陶》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,246页。
- ⑭ 刘子芬:《竹园陶说》载桑行之:《说陶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3年,43页。
- ⑮ [光绪]刘坤一、曾国藩等修《江西通志》卷九十三《经政略十一·唐英陶务叙略》,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《续修四库全书·史部·地理类(685)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,345页。
- ⑯ [光绪]刘坤一、曾国藩等修《江西通志》卷九十三《经政略十一·唐英陶务叙略》,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《续修四库全书·史部·地理类(685)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,345页。
- ⑰ 王钰欣:《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和陶政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《清史论丛(三)》中华书局 1982年,83页。
- ⑱ [清]吴允嘉:《浮梁陶政志》,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史部·政书类(278)》齐鲁书社 1996年,801页。
- ⑲ [清]朱琰:《陶说》载桑行之:《说陶》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,1页。
- ⑳ [清]蓝浦:《景德镇陶录》,载桑行之:《说陶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,218页。
- ㉑ 唐英:《奏改由九江关动支银两经办瓷务折》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二辑·乾隆朝史料》中华书局 1987年,2—3页。
- ㉒ 赵宏:《“官搭民烧”考》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96年第1期。
- ㉓ [清]唐秉钧:《文房肆考图说·古窑器考》载桑行之:《说陶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,791页。
- ㉔ 转引自熊寥:《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》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0年,303页。
- ㉕ 刘丙:《景德镇陶录序》载桑行之:《说陶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年,185页。
- ㉖ [光绪]刘坤一、曾国藩等修《江西通志》卷九十三《经政略十一·唐英陶务叙略》,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《续修四库全书·史部·地理类(685)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,345页。
- ㉗ 《乾隆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管理九江关务惠色·奏请

赏窑厂催总老格职衔折》载《宫中档乾隆朝奏折》第一辑, 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, 中华民国七十一年, 186页。

⑳[清]李桓《国朝耆献丛征(8)》卷百四十五《郎署七》,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年, 679页。

㉑[清]李桓《国朝耆献丛征(9)》卷百五十一《疆臣三》,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年, 242页。

㉒[光绪]刘坤一、曾国藩等修《江西通志》卷九十三《经政略十一·唐英陶务叙略》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《续修四库全书·史部·地理类(685)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, 345页。

㉓[清]李桓《国朝耆献丛征(8)》卷百四十五《郎署

七》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0年, 675页。

㉔《许谨斋诗稿, 癸巳年稿》转引自中国硅酸盐学会:《中国陶瓷史》, 文物出版社 1982年, 457页。

㉕刘毅:《明清陶瓷官窑制度比较》《南方文物》1992年第 4期。

㉖唐英:《奏恭进上传及自拟新样瓷器折》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清代档案史料从编第十二辑·乾隆朝史料》中华书局 1987年, 15页。

㉗唐英:《奏次色瓷器变价不能年清年款折》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清代档案史料从编第十二辑·乾隆朝史料》中华书局 1987年, 20- 21页。